

果戈理早期作品中的赫尔德思想

孙人哲

(浙江大学, 杭州 310030)

摘要: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思想对19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影响深远,在斯拉夫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青年时期的果戈理熟读赫尔德著作,他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民俗学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形成了自己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关于民族性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收录于《小品文集》(1835年)的一系列史学和地理学论文当中,也构成了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年)《密尔格拉德》(1835年)等文学作品的潜隐根基。然而,果戈理和赫尔德思想的分歧在于,赫尔德将民族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果戈理则强调民族主义为专制国家服务,这一分歧已预示了作家日后亲近斯拉夫派的政治立场。

关键词:果戈理;赫尔德;历史哲学;民俗学;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德意志浪漫主义哲学家、文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 G. Herder),是“狂飙突进”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奠基人和灵魂人物之一,他以全才著称,在哲学、语言学、历史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理论建树。赫尔德的理念是近代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思想纲领,它不仅参与构建了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地区的民族自觉意识,而且在东欧各国广泛传播,尤其受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热情欢迎,其推崇者中不乏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等知名人物。(Реморова 1989: 126)

在这种背景下,果戈理对赫尔德的思想绝不可能陌生。中学时期的果戈理已经熟练掌握了德语,他经常阅读登载德国文学和哲学作品的报刊,其中包括波戈金(М. П. Погодин)主办的《莫斯科公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波戈金是赫尔德思想在俄国的推介者之一,《莫斯科公报》曾多次刊登有关赫尔德的文章,这可能成为果戈理接触赫尔德的肇端。(Жукова 2000: 9)1831年,果戈理以描绘乌克兰风土的《狄康卡近乡夜话》(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踏入俄国文坛,对乌克兰民俗的重视成为贯穿果戈理19世纪30年代前期创作和生活的重要线索,虽然作家当时并未在作品或书信中直接提到赫尔德之名,但赫尔德身为民俗学的首要先驱,他的奠基性观念对任何一位该领域创作者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此外,自1832年起,果戈理与波戈金、舍维廖夫(С. П. Шевырев,《莫斯科公报》主编)、马克西莫维奇(М. А. Максимович,乌克兰民俗学家)等深受赫尔德影响的学者频繁通信,讨论世界通史和民族问题,这为我们回溯果戈理与赫尔德的关联提供了更多证据。

1835年,果戈理的论文《施勒策尔、米勒和赫尔德》(Шлецер, Миллер и Гердер)收录

于《小品文集》(Арабески)发表,这篇文章表明果戈理熟悉赫尔德的著述,而且对其有所批判和继承,这是唯有经过长期阅读思考才可能达到的,足见果戈理关注赫尔德已久。《施勒策尔、米勒和赫尔德》为确认果戈理早期作品中赫尔德思想的存在敞开了研究空间,而《小品文集》中的其他作品,亦证明赫尔德思想构成了作家世界观的鲜明底色。由此可知,想把握果戈理在19世纪30年代前叶的创作,关键之一就在于要了解赫尔德的精神遗产。

2 果戈理早期创作中的赫尔德历史哲学

赫尔德最辉煌的成就集中在历史哲学领域,他的代表作《另一种历史哲学》(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评价为18世纪历史哲学的“两部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伊格尔斯 2014: 36)正如该书标题所示的那样,赫尔德提供的不是某些历史方面的独特见解,而是一整套全新的历史意识,它以带相对主义倾向的动态变化的观点诠释历史,冲击了启蒙运动对普遍的理性秩序的信仰。

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存在两大核心观念。第一是个体观念。赫尔德的个体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赫尔德将文化、民族和历史等抽象概念作为“个体”概念加以阐释,相信社会科学遵循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成长和衰颓法则,由此提出历史的有机论。(伊格尔斯 2014: 41)在《另一种历史哲学》中,赫尔德以人类个体的年龄为线索,重新构建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最古老的东方宗教里,赫尔德看到了对神灵谦恭如同婴儿般的姿态;古埃及文明将这个婴孩带入儿童岁月,人类在尼罗河畔接受着文明的初级教育;古希腊人代表了令人怀念的少年时光,他们洋溢着青春的爱情和欢乐;紧随其后的古罗马人,则像是骄傲强壮的成年男子(Herder 2004: 9—21)……历史和人类生命周期之间的对照不是单纯的譬喻,赫尔德坚信历史恰似有机组织,其发展符合生命周期,呈现出人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赫尔德的个体观念意味着对启蒙思想预设的共同人性和普世价值的质疑。启蒙思想家试图将一种价值体系强加于所有的国家和时代,以“理性”为衡量准绳,东方的宗教愚昧和政治专制自然受到猛烈抨击。但是,如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都如同个体的生命周期,那么有何理由去指责一个人身处于他必须经历的发育阶段?“青年并不比天真无邪、心满意足的孩子更幸福;安详的老者也并不就比精力充沛、正当盛年者不幸”(赫尔德 2009: 17)所以,赫尔德认为,历史学只能以个体本身的特质和条件为评价标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理解世界上无穷的个体。摒弃了向壁虚构的统一价值标尺,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做到设身处地,用“移情认知”去感悟每个个体所处的环境,抛弃旁观者妄加评断的姿态。

毫无疑问,赫尔德的个体观念中,存在着相对主义的萌芽,它或许会否定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不过,赫尔德历史哲学的第二个核心观念规避了个体观念潜藏的风险。赫尔德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发展的过程,只是这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进步和发展。(伊格尔斯 2014: 42)启蒙思想家宣称,人类的进步体现在新时代相较于旧时代更理智、更幸福,历史过程是不断上升的;然而,启蒙主义的观点显然是在暗示,人类的过去是非理性和不幸福的,人类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处在历史的较低阶段,历史的“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无法调解的冲突。赫尔德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人类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幸福,它们的优劣不可能相互比较,所以庸俗意义上的进步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只有更高意义上的进步,即上帝的终极旨意逐步揭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上帝没有规定任何国家、民族或时代的地位高低,它们都只是各司其职的演员。什么是进步和幸福?演员忠实地演绎上帝分配的角色,进步和幸福就是由此而来。历史不是一场自由战胜专制、理性战胜愚昧的冲突,而是无数事件和文明串联的链条,每个时代都为上帝的终极目标贡献成果,完成任务后被链条的新一环取代。

赫尔德历史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概念,本质是在探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并使二者达到了高度辩证的统一。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有机生长的个体,历史本身的发展具有人类

个体的特征；与此同时，所有的个体又都服务于整体，即上帝无法参透的终极意志，真理在千千万万的事物中都有自己的展现方式，但真理终究是唯一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个体观念和整体观念的辩证统一：他们的使命是发现人类整体的历史真理，但为了达到目标，必须以“移情认知”的手段，立足于真理表达自身的多样形式。

赫尔德的历史有机论，他对人类历史各阶段平等、宽容的观照，以及他对历史整体中折射着上帝意志的坚定信念，几乎被果戈理照搬进了自己的作品，这一事实在《小品文集》中传达得最为鲜明，文集收录的数篇文章，如《论中世纪史》（О средних веках）《论世界通史教学》（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和《阿里—马蒙》（Ал-Мамун），都应用了《另一种历史哲学》确立的基本原则。

通过《论中世纪史》，果戈理致力于驳斥历史学界长期存在的对中世纪研究的偏见。果戈理指出，中世纪课题之所以被绝大多数学者轻视，其根源主要在于两种固有观念：第一种观念认为，中世纪野蛮黑暗，因此不值得加以研究；第二种观念认为，中世纪是杂乱无章的事件的堆积，缺乏历史运动的主线，因此难以研究。为了推翻这两种观念，果戈理以赫尔德思想作为支撑。他首先质疑批评中世纪愚昧黑暗的论调，将中世纪解读为生命周期的过渡阶段，就像“人在中小学受教育的时期”。（果戈理 1996：35）心浮气躁是少年通常的心理特征，因此，中世纪呈现出的混乱景象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不能脱离时代情境，横加指责，“如果少年讲的是审慎思考的成年人的话，岂不怪哉？”（果戈理 1996：36）何况在少年的冒失当中，往往还有活力和激情：骑士团的建立彰显出为信仰奋不顾身的热忱，炼金术的进步反照出探索世界的强烈渴求，它们证明中世纪“充满最有力、最伟大的希望”（果戈理 1996：37），为近代欧洲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针对学界认为中世纪史混乱无序的第二种观念，果戈理借用赫尔德的整体历史观加以反驳。果戈理指出，中世纪的事件看似零乱不堪，实则处处都有线索，所有个别的现象在其内部都包含着上帝的意志。在果戈理看来，中世纪的主线是教权的成长和封建主义的发展。以教权的成长为例，果戈理承认教权给欧洲戴上了精神枷锁，但他也指出强大的教权在中世纪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教皇专制，欧洲就不能保持团结，就会被伊斯兰教毁灭，是教皇帮助欧洲度过了岌岌可危的少年时代。另一方面，当欧洲各国进入能够自我管理的成年时，教权在舞台上的使命就结束了，既然上帝要求它谢幕退场，那么不管教皇“多么想维持自己正在消亡的力量，都无济于事。”（果戈理 1996：35）

在《论世界通史教学》中，果戈理再次论述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他以简练的话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一幅世界通史的完整草图，这幅草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它把所有历史事件彼此联系在一起，指明了每一事件发挥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充满“神秘的天意的思想”（果戈理 1996：46）：波斯人是专权的统治者，希腊人是艺术的缔造者，马其顿人联系起了波斯人和希腊人，其疆域又被罗马人继承，日耳曼人给停滞的罗马帝国带来了活力，诺曼人给日耳曼人增添了冒险精神，每个时代都从前人身上汲取营养，并为后继者做好准备，“仿佛不可见的神灵在所有事情上帮助人”。（果戈理 1996：56）《论世界通史教学》也提到了历史研究中的“移情”原则。果戈理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借助“移情”，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特别是运用比喻，抛弃“烦琐哲学的僵死的教条”（果戈理 1996：49），让历史生动地浮现在听众眼前。

《阿里—马蒙》则从反面论证了赫尔德提出的理论原则的重要性。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阿里—马蒙挚爱科学，他引进各国学者，相信科学是使自己的臣民得到幸福的唯一途径。然而，根据赫尔德的历史观，阿里—马蒙无法被称作真正的智者和明君，因为他盲目相信科学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人为虚构的，世界本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尺度。阿里—马蒙的抽象思维走向了关注具体条件的赫尔德史学的反面，“他全力迫使自己臣民接受他所引进的文

明”（果戈理 1996：105），不顾阿拉伯百姓的思想还处在旧时代，不顾迷信思维恰恰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所必需的，对它所处的时代而言是真正的进步。崇拜理性的阿里—马蒙既没有真正理解适合自己时代的价值，也没有意识到阿拉伯人理应扮演的独特角色；在天意的舞台上，阿里—马蒙是不称职的演员。因此，他尽管“充满对人类的真诚的爱，却成为自己臣民的迫害者”。（果戈理 1996：108）

通过对上述三篇历史论文的分析，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果戈理的历史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赫尔德思想——特别是《另一种历史哲学》中的赫尔德思想。19世纪初期，历史学被普遍认为是一门基础学科，是生发其他所有人文学科的土壤，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我们的时代主要是历史的时代……不懂历史学，就既不能懂艺术，也不能懂哲学。”（Белинский 1964：562）回溯果戈理历史哲学思想的源流，对诸多层面的果戈理研究或都将有重要意义。

3 果戈理早期作品中的赫尔德民俗学思想

终其一生，赫尔德都对欧洲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他的著述中包含大量关于欧洲各民族的论述。赫尔德的民俗学思想是他的历史哲学原则的延伸，是他将自己革命性的历史观应用于民族研究得到的结论，因此，它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具有相似架构。

第一，和人类历史一样，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具备有机体的特征，必须经历一个从萌发到成熟、再到衰败的生命周期。赫尔德不否认衰败的民族可能复兴，但这种情况毕竟罕见，以古希腊为例，赫尔德认为它的全盛期已结束，一切为复活古希腊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Herder 1800：421）从民族的有机论出发，赫尔德不能不把民族的发展看作迈向死亡的过程，“看作……一种从最初的纯洁向下的堕落”。（梅尼克 2009：351）在具体的民族研究中，赫尔德往往更加关注民族的起源阶段，因为这一阶段更加纯真，更接近生命源头而较少衰落，且暗含民族未来发展的所有要素，恰如整株植物隐藏在种子中一样。（梅尼克 2009：339）

第二，遵循价值评判的相对性，赫尔德断言，“每个民族自身之内都有自己幸福的中心”，一个民族固守自己的传统风俗不仅是通往幸福的道路，而且是唯一道路。赫尔德假设人类各民族之间存在基本的价值平等，以此假设为基础，任何民族若要寻求真理和幸福，只需在自己的传统和历史中发掘答案，按照自己天生的能力去发展；如果民族发展的基础是外来的，那就意味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连续性，其后果是文化能力的丧失和民族的死亡，这样的民族“通常已经是疾病缠身……死到临头！”（赫尔德 2009：16）

第三，赫尔德主张自然环境对民族的决定论。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指出，上帝的旨意遍布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任何个体都在扮演它被上帝指派的角色。问题在于，上帝是以何种方式决定了每一个个体在历史舞台上的位置？赫尔德认为上帝的启示只可能以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显现。因此，他关于天意决定历史的学说，最终走向了环境决定论，自然地理条件被视作塑造民族的主要力量。每个民族的灵魂中都有同等的发展潜能，但上帝为不同民族安排了各异的自然环境，使某些潜能成长，某些潜能沉睡，从而巧妙地决定了每个民族的特征。

果戈理对赫尔德民俗学思想的汲取，在《小品文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果戈理对赫尔德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深以为然。在《论中世纪史》中，阿拉伯人的严肃和注重思考被解释为东方沙漠的产物，诺曼人的狂暴源自大海的锤炼，蒙古人的扩张欲同亚洲的广袤草原息息相关。（果戈理 1996：37—38）在《论世界通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应当借助于地理学……表明土地状态是怎样影响整个民族的，是怎样给予他们特殊性格的。”（果戈理 1996：47）在《略论小俄罗斯的形成》（Взгляд на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Малороссии）中，作家指出，“因为生活方式、甚至民族性格都依赖于土地形态”，乌克兰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势使它只能孕育自由尚武的民族。（果戈理 1996：67—69）在《论五世纪末诸民族的迁徙》（О движении

народов в конце V века) 中, 亚洲的广阔天空导致了亚洲人对天体的崇拜, 欧洲遮天蔽日的森林造就了日耳曼人阴暗的神话和宗教。(果戈理 1996: 152—153—69)

其次, 作家同样以有机体的隐喻来言说民族的命运, 认为历史的盛衰更迭, 主要肇因是古老的民族步入衰落周期, 将被年轻的新生民族取代。在古罗马的覆灭过程中, 民族的衰老以格外触目惊心的规模展现出来, “嗜眠的梦不可思议地降临在整个古代世界, 那是可怕的停滞不前, 生活令人恐怖的麻木”, 侵略罗马的蛮族则被视作历史的新生推动力。(果戈理 1996: 52) 果戈理也关注民族的起源阶段, 赞颂充满生机的年轻民族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在《论小俄罗斯歌曲》(О малороссийских песнях) 当中, 果戈理认为乌克兰民歌有着“纯洁的原始幼年时期的印记, 从而也就是崇高诗歌的印记”(果戈理 1996: 124—125)——越接近民族生命源头的, 也就是越纯洁崇高的, 这背后无疑隐藏着赫尔德的民俗学逻辑。

最后, 关于民族模仿外族文化的可行性, 果戈理亦持赫尔德的否定态度, 相信最重要的价值始终在于民族本身。《论现今的建筑》(Об архитектуре нынешнего времени) 中, 作家感慨当代欧洲建筑之所以乏味, 根源在于背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地基, “对于欧洲来说, 曾有过不平凡的、基督教的、民族的建筑, 而我们把它放弃……如饥似渴地仿效所有别人的东西”。(果戈理 1996: 124—125) 在《阿里—马蒙》中, 他更加直白地说道: “教养要从民族本身汲取, 非固有的文明应当在它能帮助自身发展的限度上借用, 民族应当由自己的民族要素而得到发展。”(果戈理 1996: 81)

赫尔德民俗学思想对果戈理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小品文集》的学术论文中, 而且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1831 年出版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便渗透着赫尔德思想的色彩。在《夜话》的艺术空间里, 纯正的民族性是美与幸福的不竭源泉, 果戈理以情感真挚的浪漫主义笔调, 详尽描绘了从民族的土壤上自然生发出来的一切事物: 民族歌曲、民族信仰, 民族的娱乐和饮食……民族生活的每一细节, 在作家的笔下都显得光彩熠熠。另一方面, 远离民族土壤的贵族作派和外国风气, 是被作家辛辣批判的对象, 是使民族远离纯洁的黄金时代的祸根。《可怕的复仇》(Страшная месть) 中, 哥萨克人达尼洛痛斥外族歪风的生长: “咱们的贵族玩起波兰人那一套把戏来了, 学会了他们那种狡诈手腕……那个时代跑到哪里去了, 我的黄金时代?”(果戈理 2002a: 199)

发表于 1835 年的《密尔格拉德》(Миргород) 将赫尔德思想发展为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旧式地主》(Старосветские помещики) 描绘了一对地主夫妇人间天堂般的田园生活, 这种生活之所以能够实现, 正是因为它全面符合古老的乌克兰民族传统。相反, “从小商人堆里爬出来的小俄罗斯人”和“令人生畏的”改革家, 代表着闯入和谐生活的破坏力量, 他们毫不敬重民族文化, 或是修改自己的乌克兰姓氏, 或是盲目推行模仿外族的改革——譬如, 改革家“购置了六把质量上乘的英制镰刀”(果戈理 2002b: 25), 最终导致了庄园的毁灭。在《塔拉斯·布尔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 中, 民族传统和外族风俗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更加暴烈的形式: 波兰侵略者妄图割裂哥萨克和传统之间的联系, 逼迫哥萨克改宗易俗, 而哥萨克掀起正义的反抗浪潮。在《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том, как поссорился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 Иваном Никифоровичем) 中, 果戈理以阴郁沮丧的色调, 描绘了现代俄国的庸俗习气是怎样彻底摧毁了乌克兰民族淳朴的道德和情感, 《旧式地主》中处处彰显民族传统的黄金时代终于沦落为一个民族精神无以为继的世界。可以说, 《密尔格拉德》在某种程度上, 构成了乌克兰民族因丧失传统而逐渐衰败的警世寓言。

综上所述, 赫尔德的民俗学思想是果戈理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作家思考民族问题时所秉持的基本理论, 同时本身就给出了“民族应走何种发展道路”这一在 19 世纪俄国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的答案: 外来的因素只会败坏民族本身的价值, 民族应走最具本民族特色的道路。如此看来, 果戈理日后会跟斯拉夫派人士交从甚密, 在他接纳赫尔德的

民俗学思想时，就已经有所预兆了。

4 果戈理早期创作中与赫尔德思想的分歧

回溯果戈理在 19 世纪 30 年代前叶的思想渊源，我们发现，果戈理形成了一整套以赫尔德思想为基础的历史和民族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果戈理的观念同赫尔德可以完全划等号。无论是由于自觉的批判性继承，还是由于无意中的认知偏差，果戈理与赫尔德的思想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尽管它们容易被大多数相似点所掩盖，但正是这些分歧，直观地揭示出了其思想体系中独特的“果戈理性”。

首先，果戈理不满意赫尔德缺乏对现实的观察，他在《施勒策尔、米勒与赫尔德》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此种批评并非没有根据，19 世纪末的德国学者梅尼克同样发现了赫尔德的这一缺陷，认为：“赫尔德……不能在彻底具体的决定性和赤裸裸的自然—精神的实际性中观察生命和历史构成物。他的身上缺乏现实感和经验感。”（梅尼克 2009：357）在《施勒策尔、米勒和赫尔德》中，果戈理首先赞美赫尔德思想的深刻性和崇高性，认为谁都不可能像他那样深入探讨人类的本质问题，“他已经完全是用精神的眼光来进行观察。”（果戈理 1996：116）然而，思想的力量既是赫尔德的优势，又是他的缺陷，他过于偏重世界的宏观精神层面，却忽略了观察现实。赫尔德论述历史时，“如果事件太涉及生活和实际，那么它在那里便得不到色彩清晰的描述”。（果戈理 1996：117）为什么赫尔德会犯这样的错误？果戈理认为，问题在于赫尔德远离真实琐碎的日常生活，他在“僻静的书房中创造和消化一切”（果戈理 1996：117），所以他“在认识理想的人和人类上是贤者，但在认识人上是孩童”。（果戈理 1996：117）通过批判赫尔德思想，果戈理传递出自己的创作理想：必须创造可信的事件和形象，在普通的世情百态中寻求价值。显然，身为现实主义先驱的果戈理忠实践行了这一理想。

其次，果戈理并不拥有赫尔德般宽容的世界主义精神。赫尔德是民族主义的导师，他同时也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坚定反对者，极力避免使用“种族”一词，他的思想中已蕴含世界主义的萌芽。由于赫尔德毫无保留地承认了所有民族的完全平等地位，这一观念必然指向全人类亲密无间的乌托邦愿景，在《另一种历史哲学》的结尾，他表达了对人类之爱的渴望，希望它能多于祖国之爱和同胞之爱。相比之下，果戈理很少表现出赫尔德式的人类之爱，他实际上也鲜少提及“人类各民族具有平等地位”的赫尔德思想，尽管这一思想无疑是他挖掘乌克兰民族独特价值的动因，但果戈理似乎并不热衷将它推而广之，满足于仅仅证明本民族的平等地位。在果戈理的笔下，亚洲人“在其幼稚的智力中以为他们比其他人更聪明”（果戈理 1996：133），非洲人则“呈现智力的灭亡”（果戈理 1996：58），“在外表和感官上趋向同猴子很少区别”（果戈理 1996：133），唯有欧洲人“变得高于大自然……只有在这一大洲基督教的崇高才华得到了有力的发展。”（果戈理 1996：58）赫尔德对民族价值的认同是无限的，由此他迈向了世界主义；但果戈理首先仍然是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观缺乏世界主义的雏形，却有欧洲中心论的烙印。

最后，果戈理的国家观念与赫尔德有明显差异。赫尔德认为，民族是自然的创造，但国家不是，最自然的国家是具有单一民族性格的单一民族，而后来形成的国家组织、特别是专制国家，已无自然法的基础可言。（梅尼克 2009：384）赫尔德是专制国家的抨击者，认为专制统治是吞噬人类的深渊，把国家看作恐惧和金钱驱动的机器。（梅尼克 2009：372）

然而，果戈理从未质疑专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恰恰相反，仕途升迁的激情在作家的少年时代十分强烈，服务国家是他投身文学创作、文以载道的出发点。（果戈理 2002c：230—234）虽然果戈理借鉴了赫尔德的思想，但他的落脚点在于国家改良，鼓舞爱国精神，而非消解专制国家的存在意义。以《论世界通史教学》为例，作家在文章结尾指出，之所以有必要教授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是为了培育年轻人成熟稳重的品格，“使他们成为伟大国君的

恭顺、顺从、崇高、必需和有用的战友。”（果戈理 1996：60）再或以《塔拉斯·布尔巴》为例，塔拉斯·布尔巴临死前呐喊道：“远近各处的人民都已经感到，俄罗斯的国土上将会崛起自己的帝王。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对他不表示臣服！”（果戈理 2002b：158）这里所表现出的已然是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是对统一和强大民族国家的诉求，迥异于赫尔德意在呵护民族根系的文化民族主义。应当说，果戈理对赫尔德思想的这种演绎，他将赫尔德思想视为服务专制国家的工具的立场，与他日后创作，特别是《与友人书简选》（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中反映出的思想倾向是完全吻合的，是果戈理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政治理想的早期表现。

5 结束语

概言之，果戈理自青年时代起就了解赫尔德的思想。基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果戈理形成了一套注重普遍联系和具体条件的历史观点，认为上帝的旨意存在于历史的每一阶段和每一事件当中，他因此能够以相对客观的态度阐释人类历史，发现历史恢弘的整体性，这些观点构成了《小品文集》的理论基础。赫尔德的民俗学思想同样对果戈理产生了影响，作家从自然环境条件出发分析民族性的成因，重视民族生机勃勃的起源时代，致力于记录民族传统，发掘本民族的固有价值，排斥强加给民族的外来因素，凡此种种均为赫尔德思想的折射，并在《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小品文集》等早期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但是，果戈理对赫尔德思想的汲取是带有倾向性的。从秉持现实主义理念的作家角度出发，果戈理批评赫尔德对现实世界和人性缺乏观察；从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果戈理的关注点集中在俄国本土，他较少显露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情怀和全人类视野；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出发，果戈理寻求以赫尔德的思想开启民智、维护民族纯洁性，最终服务于专制国家，而赫尔德对国家的自然法合理性持怀疑态度。

研究果戈理早期作品和赫尔德思想的关系，既能展现两人思想的“共性”，有助于追溯果戈理的复杂思想体系的源流，为解读作家的早期作品提供重要视角，同时，对展现果戈理思想中的“个性”，亦即作家独特的性格和理想，也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 [1]Белинский В.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1)[M]. 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1954.
- [2]Жукова Е. П. Гердер и философск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в России[M].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0.
- [3]Реморова Н. П. Жуковский и немецкие просветители[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89.
- [4]Herder: 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M], translated by Ioannis Evrigenis and Daniel Pelleri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5]Herder: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M], translated by T. Churchill. London: J. Johnson, 1800.
- [6][俄]果戈理. 果戈理全集（第1卷）[M]. 何茂正译. 石家庄：河北文艺出版社，2002a.
- [7][俄]果戈理. 果戈理全集（第2卷）[M]. 陈恩冬，冯玉律译. 石家庄：河北文艺出版社，2002b.
- [8][俄]果戈理. 果戈理全集（第6卷）[M]. 冯玉律、冯春等译. 石家庄：河北文艺出版社，2002c.
- [9][俄]果戈理. 果戈理全集（第7卷）[M] 彭克巽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 [10][德]赫尔德. 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的文选[M]. 张晓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11][德]梅尼克. 历史主义的兴起[M]. 陆月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 [12][美]伊格尔斯. 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M]. 彭刚、顾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版社，2014.

Herder's Philosophy in N. V. Gogol's Early Writings

Sun Ren-z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Abstract: German philosopher, John Gottfried von Herder, has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Russian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th century, and it was his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that contributed most to the awakening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lavic peoples. N. V. Gogol in his youth learned off Herder's works, and on the basis of Herd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folklore, Gogol developed his own understandings of general laws in human history, characters of nations and their destiny. These thoughts of Gogol are directly expressed in *Arabesque* (1835), a collection of Gogol's articles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and are strongly hinted in his early literary works, such as *Evenings on a Farm Near Dikanka* (1831) and *Mirgorod* (1835). However, Gogol has a quite different view from Herd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Herder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 over state, while Gogol sees a culturally independent n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a powerful autocratic country: in this sense, he is closer to Slavophiles.

Key words: Gogol; Herd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folklore; nationalism

作者简介：孙人哲（1998—），男，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硕士，从事俄国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21-06-25

[责任编辑：刘 轶]